



智库丛书



文化丛书

主编 傅才武

传承与新变·

近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戏剧市场研究
(1912—1937)

陈
庚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智库丛书

路 珈 智 库

文化丛书

主编 傅才武

传承与新变·

近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戏剧市场研究
(1912—1937)

陈
庚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承与新变：近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戏剧市场研究：1912 ~
1937/陈庚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1

ISBN 978 - 7 - 5161 - 6404 - 4

I. ①传… II. ①陈… III. ①戏剧市场—戏剧史—研究—
北京市—1912 ~ 1937 IV. ①J80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693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曦
责任校对 孙洪波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323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华民族文化现代化进程中 学术共同体的责任

——《珞珈智库文化丛书》序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傅才武

我们幸而生在国家现代化建设狂飙突进、社会大转型的激情时代。1840年开始的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在经历了无数的踌躇、蹉跎和峥嵘的岁月之后，到21世纪终于达到一个瑰丽的高程。其间，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经济现代化的高歌猛进，中华民族的文化现代化也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面临无数机会和众多不确定性的大环境里，似乎每一个人都拥有了任意挥洒的空间。

一 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对学术研究和 理论创新的要求

文化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百年来数代人的不懈追求。作为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现代化是民族国家现代性的起步、形成、发展以及国际学习互鉴的复合过程。世界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在内的全方位变迁过程，其中，文化现代化是最复杂、最深层、最艰难的变迁。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包括：一种具有现代性的思想观念或者价值观的形成、发展和定型以及融入社会伦常的过程，文化要素的创新、选择、传播和退出社会交往结构的复合过程，不同国家追赶、学习借鉴和形成全球公共文化领域的国际互动过程。文化现代化的外延包括：公共和私人文化设施设备、文化产业和文化传播网络等文化载体的现代化，文化生活、文化内容、文化形式、文化观念、文化体系和文化管理等文化制度的现代化，掌握现代科技手段、拥有现代观念的人的现代化等。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伴随着中外碰撞、古今交迭的文化变迁。在农耕时代，中华文明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以东方伦理智慧、独具韵味的古典审美影响着世界的文化发展进程。进入18世纪，西方乘着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东风，科学和工业文化迅速发展，而中华帝国仍然停留在农业社会阶段，并日渐封闭而孱弱。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欧诸国，日益形成了新兴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优势地位，19世纪中叶，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国门，中国社会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下，中华文化因此而开启了艰难、壮阔的文化现代化历程。

鸦片战争以来，作为后发赶超型现代化国家，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技术现代化（“变器”）——管理现代化（“变制”）——政治现代化（“变政”）——文化现代化（“新民”）、由物质到精神文化层面逐步深化的递进变迁过程。文化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高级阶段，经过百年的积累，到当代中国业已进入关键阶段。并且，由于当代中国出现了科技上从第四次技术革命向第五次技术革命转型、经济结构上从苏联计划模式向英美市场模式转型、社会结构上由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核心的传统现代化模式向以信息化为核心的后现代化模式的转型，这三种叠加转型构成了文化现代化的复杂环境，使文化现代化面临错综复杂的局面，迫切需要文化理论界从学术层面上回答文化理论、文化管理和文化政策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

例如，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看待中国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文化、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关系并科学评价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什么是21世纪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和建设路径？如何评价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并科学处理这种差异？如何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同时完成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如何对待文化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并提升文化现代化对中国社会整体现代化进程的积极作用？如何发挥文化现代化对于“人的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如何评价和定位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全社会文化行业发展的重大影响？

这些都涉及当代文化理论界的理论创新和学术突破。这种强烈的时代需要一方面要求学界进行理论探讨，出现一批创新性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又体现为强烈的和紧迫的文化实践需要，要求从管理和政策层面上涌现出一批应用对策研究成果。当然，应用对策成果必须以理论成果为基础。但

值得注意的是,在强烈的实践需要的推动下,在我国学术界中有一定理论色彩但更偏重于应用研究的文化产业学、文化经济学、文化市场学、文化管理学等成果迭出,发展迅速,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文化现代化在实践层面上的进展对学术研究的深刻影响。

二 我国学界对国家文化理论和应用 研究需要的积极回应

作为国家对于当代民族文化现代化要求的回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了艰难的文化体制改革历程。三十多年来,中国政府和社会努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体系、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与传播体系、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体系、文化对外开放体系以及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建设,均可以理解为国家组织层面上对当前民族国家文化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回应。而这些国家文化体制改革执行系统本身的改革转型过程即面临着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创新问题。

从1979年到2015年,在民族国家文化发展对于理论和学术需求的关键时期,我国文化界和学术界面对国家的文化改革发展实践,逐步认识到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义务和责任,并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从1998年开始,全国各大高校和知名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纷纷创建文化领域的“产、学、研、用”综合性研究平台,通过设立专门研究机构、组织专业团队和专注于某一专业领域,逐步形成了全国文化领域的知名文化研究机构,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文化领域专业智库的作用。如,1999年和2000年,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与文化部共建“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分别出版《中国文化产业报告》或者前沿报告(蓝皮书);2007年,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云南大学与文化部共建“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2009年,文化部与武汉大学共建“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2011年,在财政部的支持下,文化部与武汉大学共建“国家文化财政政策研究基地”,这也是文化部在财政部支持下与高校共建的唯一一个国家文化财政政策研究基地;2014年,文化部又与中国传媒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深圳大学、复旦大学共建“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筹)”;2014年,文化部选定国

家行政学院、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设立“文化部文化改革与发展研究基地”，旨在从宏观战略和政策研究层面上服务于国家“十三五”及长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的需要；2015年，为配合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研究需要，文化部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共建5个国家公共文化研究基地。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和深圳文化研究中心等一些文化研究机构，也成立了文化产业或者公共文化政策研究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哲学所为基础，整合相关研究力量成立了“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先后设立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和“国家文化财政政策研究基地”。

文化部与高校共建的这些智库研究平台，因为有了明确的目标任务指引，并且能够将高校理论研究力量和文化行业实践需求有效地整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推出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蓝皮书系列），北京大学推出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前沿报告》、《中国文化企业发展报告》，清华大学基于中外比较视角推出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咨询报告系列，都形成了较大的影响。正是在这些成果的带动下，全国文化机构逐步形成了以“蓝皮书”和“咨询报告”为主干的应用性研究体系。如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推出了《中国文化产业年鉴》，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联合武汉市委宣传部推出了《武汉市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推出了《中国文化科技发展报告》，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国家文化财政政策研究基地）相继推出了《中国文化创新报告》和《中国公共文化政策实验基地观察报告》（蓝皮书）系列。由于实践对于理论创新的紧迫需求，近年来文化学界关于文化产业和文化管理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政策和战略层面，由此形成文化理论创新的支点，再深入到文化经济学、文化市场学和文化管理学，以及艺术经济和艺术管理领域，产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这大体是近十年来中国文化学界的具体情状。

与此同时，值得学界关注的是，在研究任务的牵引下，各个文化研究机构开始建构自己的特色研究方向，这促进了高校研究机构结合各自特色优势、学科互补，在客观上形成了全国专业发展态势。如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形成了关于国有文化企业和全国文化产业宏观战略研究的特色方向；国家行政学院形成了文化体制改革与公共文化政策的研究方向；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形成了关于文化企业研究和创意经济研究的特色方向；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形成了传媒经济与国家文化政策的特色方向；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形成了国家文化安全与公共文化政策的研究方向；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则形成了文化传播和广播电视电影以及新媒体文化产业的研究方向；云南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结合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形成了地方特色文化产业的研究方向；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中心形成了民族民间文化与数字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文化科技融合研究方向；山东大学立足于文化与经济的学科优势，形成了区域文化产业规划和区域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方向；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立足于深圳发达的文化产业和文化科技企业，形成了文化科技融合研究的特色研究方向。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要求学界和理论界必须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制高点上，科学地回答有关民族文化遗产创新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些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回应，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学界对于国家文化现代化要求的理论自觉。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在文化部和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2009年4月，文化部与武汉大学共建的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成立，并先后建成了“国家文化财政政策研究基地”和“文化改革发展研究基地”。2015年4月，由这三个国家级文化研究基地组成的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成立。作为文化部与武汉大学共同建设的跨行业、跨学科、高层次的国家公共文化政策和文化产业研究平台，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采用“部校共建、实体建构、开放合作、专兼结合”的管理与运行机制，由文化部与武汉大学共建共管；依托我国文化领域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武汉大学多学科的综合优势，组织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政策的基础理论和应用对策研究，为国家和各级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智库支持。

正是在这一目标的引领下，2009年以来，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承担了多个文化理论和政策创新研究的重大项目。如，2009年承担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文化产业的投融资及财政政策研究》，2013年承担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艺术类重大招标项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运行中的财政保障标准与保障方式研究》，

2014 年承担了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国家文化产品网络评价平台研究》，2015 年承担了科技部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荆州大遗址楚文化数字化保护与传播技术集成示范》等。这些重大项目，聚焦我国文化产业、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沿问题，努力推动我国有关文化管理学、文化政策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学术创新。

三 武汉大学建设特色新型文化智库的努力

2009 年 6 月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建立以来，根据武汉大学关于理论研究要对接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重大问题的目标要求，特别是在文化部、财政部等委托的政策咨询任务的牵引下，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开始了文化领域专业型智库的建设进程。按照建设专业智库的基本要求，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先后组织实施了“1 + 100”国家公共文化政策实验基地建设项目，建立完善了“文化第一线”调查系统和全国文化信息基础信息库。

从 2011 年开始，武汉大学启动实施“1 + 100”国家公共文化政策实验基地建设项目。在财政部和文化部的支持下，武汉大学在东、中、西部选择省、市、县、乡镇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群艺馆）、艺术团体、文化站、非遗保护中心等代表性文化机构共计 100 家，建立公共文化政策实验基地，与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进行对接，分别发挥武汉大学的学术研究优势和地方文化机构的实践操作优势，形成“1 + 100”的新型综合性文化政策和文化管理研究网络。从 2009 年开始，武汉大学开始筹建全国高校第一个实证调查系统——“文化第一线”调查系统。这一调查系统充分利用武汉地区高校丰富的大学生志愿者资源，在每年的寒暑假期间，组织大学生志愿者（约 250—450 人）就基层文化建设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专题问卷调查。近年来，先后完成全国范围内农村与返乡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全国“四馆一站”免费开放、全国公共文化机构绩效评价、文化参与人口等调研项目 10 多项，在全国高校建立了第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行业实证调查系统。2012 年起，在国家财政文化部门的支持下，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整合财政、文化文物、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体育的相关数据资源，结合武汉大学自身的实证调查数据，聚合

成为国家文化发展基础数据库，以形成我国文化领域特色新型智库的基础。

2015年1月，国家出台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国家软实力，推动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2015年5月，武汉大学牵头，联合清华大学、吉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四川大学、同济大学、新疆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及研究机构，共同创建国家文化软实力协同创新中心。协同创新中心拟紧扣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一主题，将中华文化的生成发展与演进、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构建、中国国家文化形象塑造等作为研究重点，并推出一批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

作为武汉大学“国家文化软实力协同创新研究中心”的一部分，近两年来，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加快了智库建设的步伐，在原来的基础上，拟推出一批最新学术成果，决定出版《珞珈智库文化丛书》（第一辑），包括：《国家文化体制的起源、演进与定型——社会变局中的政党、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导权》、《传承与新变：近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戏剧市场研究》和《文化产业与金融工具》三部学术著作。前两部著作力图从历史纵深的角度讨论文化行业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化行业与市场的关系；后一部著作主要讨论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工具问题。《珞珈智库文化丛书》将持续推出第二辑和第三辑，未来将致力于我国文化管理和公共政策理论研究，以理论创新不断推进国家文化体系的改革与发展，努力在服务于国家战略需要和社会文化实践需求的过程中，体现当代文化理论研究和学术创新的固有价值。

目 录

导论	1
一 研究缘起	1
二 研究综述	4
(一) 新中国成立前关于民国北京戏剧的研究	5
(二) 新中国成立后对民国北京戏剧的探讨	12
(三) 关于民国北京戏剧研究的评析	22
三 研究内容和结构	24
四 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	25
第一章 北京戏剧市场发展概况	27
一 北京戏剧市场的历史流变	27
二 1912—1937 年间北京戏剧市场的社会文化环境	30
(一) 由帝都、国都到地方城市的政治性变迁	30
(二) 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与传统手工业并进的经济 体系	32
(三) 近代民主思潮传播与文艺论争中的文化环境	33
(四) 近代报刊繁盛兴替下的大众传媒环境	35
第二章 北京戏剧业的市场构成	37
一 戏班	37
(一) 戏班的组织结构与管理制度	37
(二) 特殊性的戏班组织：科班与票房	48
二 剧场	57
(一) 民国北京剧场的基本概况	57

(二) 剧场外部形制结构的变迁	61
(三) 剧场内在组织结构体制的建构	68
三 观众	73
(一) 观众的群体结构与阶层等级	73
(二) 观众群体的消费行为特征	80
四 行业组织	90
(一) 梨园公会	90
(二) 剧场公会	96
(三) 其他行业组织	97
第三章 戏剧市场的演出业态	99
一 营业戏及其演出业态	99
二 堂会戏及其演出业态	117
(一) 堂会戏及其特征	117
(二) 堂会戏演出的基本业态	120
三 义务戏及其演出业态	125
(一) 义务戏及其特征	125
(二) 举办程序及其盈利水平	126
(三) 义务戏的类型及其演出业态	131
第四章 戏剧市场的运营机制	138
一 戏班与戏园的经营运作	138
(一) 戏班与戏园的合作机制:由“轮转制”、“固定制”到 “自由合同制”	138
(二) 戏园售票机制的建立	145
(三) 戏剧市场中的副业经营	148
二 戏班、戏园的经济收入与分配	159
(一) 戏班的收支与分配	159
(二) 戏园的收支与分配	160
(三) 戏班与戏园之间的分配机制	162
三 戏剧市场与大众传媒的合谋	164
(一) 传统戏单广告方式的延承与变迁	165

(二) 大众传媒的“硬广告”表达	170
(三) 大众传媒的“软广告”传布	174
第五章 戏剧市场的竞争与业态变迁	187
一 民国时期北京戏剧市场的竞争态势	187
(一) 电影等新兴娱乐对戏剧市场的冲击	187
(二) 戏剧市场的竞争形态	193
二 激烈竞争中的戏剧业变迁	203
(一) 名角挑班制的形成与烂熟	203
(二) 严整型戏班结构向松散型戏班结构的演变	210
(三) 艺人间的等级分化与收入的悬殊化	216
(四) 戏价的变迁及其影响	220
(五) 戏剧交流互动的加强与传播流布的拓展	224
第六章 政府对戏剧市场的管制	228
一 政府官方机构对戏剧市场的管理与控制	228
(一) 1912—1927 年间北京政府对戏剧管理的 尝试与探索	228
(二) 1928—1937 年间北平市政府对戏剧市场 管理的推进	239
二 戏曲审查委员会对戏剧市场的审查管理	245
(一) 戏曲审查的类型、范畴与程序	245
(二) 剧本审查及其处理方式	247
三 戏剧市场的税收管理及其历史特征	262
(一) 民国北京戏剧税捐的变迁与演替	262
(二) 北京戏剧业的税制特点与管理特征	267
第七章 余论：近代化进程中北京戏剧市场的发展阶段及其 转型特征	273
一 共时性观察：国外主要戏剧市场发展形态	273
二 比较性审视：北京戏剧市场的发展阶段	276
三 历时性变迁：近代北京戏剧市场的转型特征	284

参考文献·····	288
一 史志、档案资料·····	288
二 报刊资料·····	289
三 著作类·····	290
四 论文类·····	296

导 论

一 研究缘起

与中国戏剧的萌生、形成和发展过程相随，戏剧市场的发展演变也由来已久，但对戏剧市场的探究却远远不足。从中国历代戏剧的文献史料来看，记载和保存剧本文献较多，而记载戏班活动、演剧场所经营、演出市场流变的资料并不多见。明清以前有关戏剧活动的资料可谓寥若晨星，明清时期对戏剧活动的记载略有增加，直至近代大众传媒的出现，关于戏剧市场的记载才真正繁多起来。虽然近代戏剧市场的资料已较为丰富，但大多数的研究仍然循导以声腔剧种为中心的戏剧史研究故道，对戏剧市场的关注度不高，这不失为一种缺憾。

北京戏剧市场的研究是以市场为中心，探究戏剧组织的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这种研究不同于传统的戏剧史研究，但对戏剧史的研究应当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选取 1912—1937 年间的北京戏剧市场^①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从纵向的时间进程来看，民国时期的戏剧在继承中国戏剧发展传统的基础上，再次创造了辉煌。

民国时期的中国政治动荡、内忧外患，“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未

^① 对本书的研究对象，有两点需要加以说明：一是北京在 1928—1949 年间改称北平，为使文章研究对象指称明确，本书在宏观论述上使用北京的称谓，在具体的时间段范畴内使用北平的称谓。二是关于戏剧概念的使用问题。一般而言，戏曲指中国传统戏剧艺术，戏剧则是戏曲、话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的统称，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引入了话剧等一些西方演出形式，使用戏剧的概念更能涵括本书的研究对象。

完结，社会系统内存在着新旧交替、中外交锋融汇的矛盾运动，但戏剧活动作为市民大众的主要娱乐方式却再次达到一个顶峰，其中缘由颇值深思。可能的解释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因素不断成长的情况下，民国时期的中国初步形成了较为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使戏剧业的商业化程度不断加深，从而推动了戏剧市场的繁荣。在剧种方面，京剧确立和巩固了第一大剧种的地位，其他地方剧种也迅速崛起。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的不完全统计，现存的 300 多个剧种，在清末至民国期间形成并得到发展的竟多达 127 种。^① 在演出团体方面，戏班逐渐由集体制向名角挑班制转型，名角在戏班中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角色之间的竞争加剧。在剧场方面，一大批新式剧场在中国的各城市陆续建成，新式舞台技术和设备也不断引入，极大地提高了观演效果。在伶人培养上，科班教育、戏剧学校、手把徒弟等形式丰富了戏剧教育的手段和方式。在市场运营方面，近代大众传媒的广告宣传方式得到广泛运用。一系列的近代化新变，不仅促成了戏曲市场的繁荣，也进一步推动了全国戏剧艺术的传承和革新。

第二，从横向的地理空间来看，北京长期作为帝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戏剧活动的集聚地和中心区，其戏剧市场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

北京戏剧在辽金以前已孕育和萌生，正式形成于辽金时期。元代，随着元杂剧的兴盛，作为国都的京都戏剧市场形成第一次发展高潮。明代中前期，杂剧的式微使北京戏剧市场较为沉寂，戏剧中心也发生南移，明末南方的弋阳腔、海盐腔、昆山腔的传入使北京剧坛再次活跃。清代，“花雅之争”、京剧生成和地方戏的不断成长使北京戏剧市场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峰。民国时期，北京戏剧在延续清代的基础上实现了近代化的传承与新变，掀起了又一个戏剧高潮。从北京戏剧发展史来看，虽然也经历了沉寂阶段，但长期以来都是整个中国的戏剧文化中心，因此，研究北京戏剧市场可以达到“管窥一斑，可见全豹”的效果。

第三，民国时期的北京城经历了由帝都向近代都市的转变，致使戏剧业面临了与以往所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出现了一系列的近代性新变。

在专制帝制时代，北京城只是皇朝宫廷的附属物，城市的基本职能主

· ① 蒋菁等：《中国民国艺术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38 页。

要是服务于皇朝统治和宫廷生活，因此，民国以前的北京未曾有独立意义上的地方经济和作为一个城市的地方市政建设。而到了20世纪初年，尤其是在专制帝制瓦解和民国诞生后，北京才作为一个较为独立的个体向近代都市转变。这个转变的开始晚于上海、广州、天津等沿海开埠城市，甚至晚于武汉、南京等沿江开埠城市，但向近代都市转变和过渡的一系列过程基本都发生在民国年间，整个变迁过程相对较短。在如此急风暴雨般的近代化变革中，北京在都市建设、市政管理、地方经济发展和近代市场体制建构中完成了生发和完善的过程，所以北京都市近代化的过程显得快速而仓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作为都市娱乐业主体的戏剧业在一系列近代化新变的过程中迸发出强大的活力，活跃和带动了整个北京城市的文化娱乐市场，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因此，研究民国时期的北京戏剧市场又具有不同于专制帝制时期的一种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本书将时间的上限定于1912年，是因为作为专制帝都的北京直至清王朝的覆灭才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一段崭新的近代化进程，在这之前的北京戏剧仍旧深受专制皇朝的影响，戏剧的近代化变革难以全面展开。本书将时间的下限定于1937年，是因为1937年抗战爆发至1949年解放前这一期间，由于受战乱影响，北京戏剧演出活动多方受阻，渐趋式微。这段时间内，纯粹性的商业性戏剧活动大量减少，而戏剧演出的政治意识形态宣传功能得到提升，虽然在推动抗战胜利中起到了相应的作用，但也使戏剧业偏离了行业发展的本体轨道，渐失昔日风采。^①因此，本书的研究将1912年至抗战爆发的1937年作为研究的分水岭。

① 在抗战后，由于战争的影响，传统戏剧业遭受重大打击，渐趋式微，时人对这一趋势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如，1938年创办的《立言画刊》上发表了几篇时人评论旧剧危机的文章，金仲荪《旧剧摧残之危机》，创刊号，1938年10月1日；红叶《国剧进化欤？退化欤？》，第2期，1938年10月8日；红叶《国剧评坛——京剧已渐步入没落时期受海派之影响》，第8期，1938年11月19日；文鹤荪《希望京朝派名伶负起保存京戏责任》，第15期，1939年1月7日；黄帆：《旧剧没落及其新趋向》，第200期，1942年7月25日。戏剧杂志《半月戏剧》也发表了讨论旧剧危机的一些文论，如马二先生《旧剧是否衰落的探讨》，第1卷第7期，1938年5月24日；许黑珍《京戏从此带病延年吗？》，第2卷第12期，1940年9月15日；等等。